

台湾版蒋中正日记解读大陆首次公开

# 蒋中正日记揭密

从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

蒋中正侍从秘书之子

[中国台湾] 阮大仁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蒋中正 日记揭密

蒋中正侍从秘书之子  
「中国台湾」阮大仁著

从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

台湾版蒋中正日记解读  
——大陆首次公开——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蒋中正日记揭秘 / 阮大仁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75-3817-5

I. ①蒋… II. ①阮… III. ①蒋介石 (1887~1975) 一日记 IV. ①K8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1637号

书 名: 蒋中正日记揭秘  
标准书号: 978-7-5075-3817-5  
著 者: 阮大仁  
责任编辑: 宋军占 钟卫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投稿邮箱: [zhong58336279@163.com](mailto:zhong58336279@163.com)  
电 话: 编辑部010-58336279 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70  
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一

杨天石

胡佛研究所有一座咖啡厅，所内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公余都可以去坐坐，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几块点心，是一个舒心悦意的聊天所在。2006年，我应邀到胡佛档案馆研读蒋介石日记，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常爱到咖啡厅坐坐。某日，见四五位中国同胞已经先在，正围桌团坐，听其中一位谈蒋介石轶事。这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癯，江南口音，谈兴正浓。我凑进去，介绍之后，得知这一位便是阮大仁先生。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为报刊写过十年政论，也曾跃入商界遨游。他博览典籍，爱好文史，精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真正的才子和多面手。我们初次见面，相谈颇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此后，

我每年去胡佛研究所，都要和大仁先生见几面。大仁先生熟悉掌故，健谈也爱谈，尤好长谈，每次见面，只要话题一开，大仁先生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只要带着耳朵恭听就可以了。有一天，在大仁先生寓所的宽大阳台上，一边眺望山野景色，一边谈民国史事，天黑后，转入室内，灯下续谈，仍然是大仁先生当主角，不觉已经夜深，我起身告辞，大仁先生意犹未尽，殷勤挽留，表示可以继续谈下去。

大仁先生所谈，有许多可以稽诸文献，但是，也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辛。我虽研究民国史多年，与大仁先生谈话，常有闻所未闻之感。后来了解到：大仁先生的祖父阮性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民国建立；父亲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长达十余年，国民党迁台后，追随蒋介石，历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所著《中央工作日记》至今仍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大仁先生自述，毅成先生曾告诉他不少政坛秘闻，为防窃听，有些则是在大街小巷散步时所告。此外，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人有意讲述一些事情，企图借大仁先生之笔传世；大仁先生有时也有意向他们请教、打探、求证。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治史，当然主要靠档案和文献，因为此类资料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比较准确、可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档案、文献亦不尽可靠，而且，它绝无可能记录所有历史家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事件、过程、情节、细节，不可能见之于文字，或根本不能见之于文字，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周资博采，收集当事人，或相关人的回忆、口述，包括传闻等资料，然后与档案、文献对照、检核，验证，择其可靠、可信者入史。这样做，可以使历史学不仅真实，而且丰富、全面、生动。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年就是如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既利用了汉朝的国家档案，也是他行万里路，周游

各地，广泛调查、访问的结果。

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

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 序二

郭岱君

大仁兄写史有独特的方法。他擅长从“人”的角度观察历史事件，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互动、他们的背景、派系、思想、人事关系等，有时还触及个人的性格及心理状态；而笔下的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严家淦、叶公超、黄少谷、唐纵等，这些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几乎都见过，而且与他父亲阮毅成先生过从甚密。

在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中成长，了解其中的复杂与微妙，大仁不但能得到一般学者所无的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而且他读蒋介石日记，别有一番体会。再加上大仁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因此他能见人所未见。

例如，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关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孙中山逝



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分掌党政军。当时汪早已是资深的“革命领袖”，而蒋则出掌黄埔不久，在党政方面的资历都去汪甚远。可是，仅仅十数年间，蒋汪几度分合，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局亦别于天壤。蒋当年曾领导过抗日，也是当时国际上公认的中华民国领袖；而汪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

究其原因，两人对日和战态度不同、以及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固自是主因，但彼此地位消长带给汪的委屈与不平，也不能忽视。在大仁的文章中，他父亲阮毅成先生（时任汪精卫机要秘书）对汪近身的观察，就颇耐人寻味。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欲把党权定于一，以因应抗日。大部分党员的共识是由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原来在名义上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坚拒出任副总裁。汪向蒋表达这个意思，蒋也同意了。可是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中，汪却被动地陪着演了一场不愉快的戏。当日蒋本人回避，汪担任大会主席。选举总裁、副总裁本是两案，先选总裁、再选副总裁，没想到吴稚晖提案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并成一案，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赞成也不是、不赞成也不是，尴尬万分，踌躇几秒，只好也起立鼓掌。当时也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先生清楚看到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觉得被蒋摆了一道。毅成先生指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经河内转赴日本，另立“维新政府”，多少与此事有关。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互动的机会，一般历史学者是很难有的。本书所收集的五篇文章，除了第四篇外，其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如1961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突被召回，当场免职，而且不许其回到华盛顿办理交接。为什么素受蒋介石夫妇信任的叶公超，突然遭受这么严厉的处分？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蒋介石日记刚开放时，不少台湾媒体及学

者特别来找答案，也有几位朋友特别托我查看这段事故。

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

大仁指出，蒋陈都是刚强不折的个性，本来中间有位性情圆融的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作为润滑剂，化解冲突，可是1963年张群自己也有问鼎“行政院长”之意，因此不但未能疏通两人心结，反而火上加油，最后导致陈诚愤而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不久即因病过世。

当时有意争取“行政院长”的，除了张群，还有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和周至柔（“总统府参军长”）。三方各有利弊，蒋难以取决，但又执意要拿掉陈诚，最后跌破众人眼镜，匆匆找来政学系的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

大仁的分析引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这些内情，则是当事人或参与协调折冲的王云五、陈雪屏（“行政院秘书长”）亲口所述。阮毅成先生时任“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也亲见1963年整个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高层的互动。

大仁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一）他的分析充分证明正史不可尽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多为官样文章，免不了有所隐瞒或偏失。历史事件有其多面性，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带，治史者必须特别留意。

（二）他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从他们公开的、官方的言

行去看，而是要观察他们私下的言行，才能碰触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参与或知道事件真相的人，经常会陷入不能讲、不愿讲或讲不清楚的困境。如何判断？如何挖掘真相？就要靠治史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三）大仁笔下的历史充分显露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及蒋介石的领导统御模式。在每一篇文字中，蒋介石的领导模式、性格、决策的心路历程，还有国民党领导人的派系、彼此的互动、特别是他们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腻的脉络，一一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真是一部活历史！

杨天石教授曾戏说大仁是“二史堂”——信史加野史。事实上，正史（特别是现代史）在目前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史家除非掌握各个方位，还要力求客观，否则很难窥其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仁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访查、拼凑，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为此，我要诚挚地向大仁致敬、致贺！

（郭岱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 序三

吕芳上

2010年12月，阮大仁先生出版《放声集》，虽属政论文字，但事涉1970年代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所论集中在台湾的民权与人权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说论，已成为台湾民主化的重要象征与文献；如论作者的写作态度，以“放声不愿误苍生，博学终为读书人”，大约可以概括。从政论转到历史研究，作者秉持同一心态：识力、风骨、坦然、洞见，完成的新书《蒋中正日记揭秘》，当为时下蒋中正研究风、民国热，添薪加材，延烧熊熊之火，格外引人瞩目。

收录在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是1948年至1963年间，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的史事，的确为所谓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的十五年，留下了时代的可贵记录。蒋中正一生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虽说台湾时期最称安定，但小局面下，对内对外，依然波涛汹涌。撤退到台湾的蒋，最关怀的几件事，一是稳

定局势寻求再起，故有党的改造、政治戒严、寻求接班人；二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故土，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直到1963年希望才告破灭；三是维系民国命脉，保有国际地位，故外交上亲美、巩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成为每年耿耿于怀的大事。内政外交交错，政治案件往往因之迭起。其初，国民党内部派系、地域之见，仍时隐时现，化为权力之争，每见出招、接招戏码，CC派与政学系，见于1948年陈立夫、张群组阁之争；1963年陈诚、严家淦的下台与上台，也见“团派”与政学系的身影。1961年叶公超去职案，在蒋眼中，涉大不敬、“欺君”、“卖国”、抗命诸罪，内情扑朔迷离，经作者的分析，此事牵及中美间有关联合国代表权及外蒙入会案之交涉，对美外交第二管道的出现，加上叶公超洋派作风，辅以小报告的推波助澜，终造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人谈历史，看表面文章不难，要掌握内幕不易，作者于重要史事内情，每娓娓道来，读之于知人阅世增益颇多。

历史学者多深知，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由大事权衡历史关键问题为治史之道，大仁先生综论史事的典雅文字，正落在非易易的窍要论述上，此正见其智慧与才情。作者之所以有这套功夫，有家世的渊源，也有自修所得之涵养。大仁先生先祖性存（荀伯）先生，清末法政留学生，曾与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同学；其尊翁毅成先生在五四时期已崭露头角，活跃浙江学界，其后历任党政要职，留下的“从政工作日记”与口述历史，正是作者据以为文的宝库。大仁先生个人才气不凡，高中时代众生懵懂时，他已有成熟文章面世；大学时代，与刘氏兄弟等，共享“上官鼎”笔名，引领众人进入武侠世界。1970年代的政论文章，分析时政，筹思振笔，发为时评，每见真情。待新世纪投入历史写作，以美国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又读企管、电子计算器工程者，复见其文史根底之雄厚，不论史事论断、人物月旦，于公私夹叙中，有想像但逼真；于太史公笔法中，有感喟不失其公义，所谓智烛机

先、谈言微中，发人所未发、见人所不见，尤使专业史家自叹弗如。

2007年蒋中正日记公开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趋之若鹜，个人因此连续三个暑假也附会风雅，得晤大仁先生。犹记当时每逢傍晚时分，多数同道聚集咖啡厅，海阔天空论议抄录日记心得，更且品评时政。大仁先生往往放言高谈，其丰富见闻，开阔眼界，纵论古今，谈笑风生，倾倒众人，而谈论史事之关键处，尤有肯綮之见。如今大仁先生以近几年来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事文字集结成书，虽为私家之作，但不可仅视为政坛秘闻。往事并不如烟，本书相关文字对现代史事提供之多元视角及精辟见解，于转型关键时期之历史，尤有见微知著之用，读者幸毋轻忽。爰以为序，并请大仁先生及前辈指教。

（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

# 自序

## 一、本书内容的简介

二〇一〇年冬天，台湾学生书局替我出版了一本书，是为“放声集”之第一辑，题材为台湾的人权与民权问题之探讨，一共收录了三十八篇拙作。其中除了两篇之外，都是在一九七〇与八〇年代所发表的。目前学生书局正在安排出版那套“放声集”的第二辑，主题是我有关蒋中正先生的作品，是为繁体文版。而这本书的简体文版则收集了其中的五篇文章，这些都是发表在台北的传记文学月刊上，为北京的华文出版社主事者所选取与编辑而成书的，并承代为取了书名。

这五篇文章所记述之史事，以时间去分，则为：

（一）一九四八年在南京，国民党的“CC”系在陈立夫主导下，违抗了蒋中正的意愿，先后分别阻挡了“政学系”的张群（岳军）之出面组阁，



以及晋阎系的李培基去出任“立法院长”。此是蒋中正在大陆撤守前夕，愤而自“总统”职位上引退的两个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蒋系军队覆灭之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挟重兵以逼宫。

（二）一九五四年在台北，陈诚出任“副总统”，以及一九六六年在台北，严家淦出任“副总统”时，蒋中正“总统”在幕后如何安抚其他角逐此位者之经过。也用以对照并说明何以在一九九二年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择李元簇为副地区领导人时，之所以会造成国民党分裂的原因。

（三）一九六一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被免职之经过。

（四）自从迁台以后，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陈诚已成为蒋中正的接班人，他逐步出任了国民党的副总裁，政府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久已坐二望一。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陈诚突然辞去“行政院长”之兼职，改由严家淦“组阁”。随后在一九六五年陈诚病逝，而在一九六七年由严氏继任“副总统”，并且终于在一九七五年蒋中正去世时，得以继任“总统”。因此一九六三年之陈下严上，是国民党“政府”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细读了一九六三年全年的蒋中正日记之后，我发现当时陈之下台是为必然，而严之上台则纯属偶然，是“无鱼虾也好”的急就之章，这真是一件令人吃惊之事也。

## 二、蒋中正日记之问世影响重大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代为保管了蒋中正日记之后，逐步将之公布，并在二〇〇七年中大功告成也。

对研究中国近代史者来说，蒋日记之问世，实在是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笔者因为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乃可多所取